

张季鸾庐山三谏蒋介石

贺伟

1941年9月6日,《大公报》总编辑张季鸾在重庆病逝,年仅53岁。蒋介石在唁电中称:“季鸾先生,一代论宗,精诚爱国,忘劬积瘁,致耗其躯。”毛泽东、陈绍禹(王明)、秦邦宪(博古)、吴玉章、林伯渠的联名唁电称:“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,功在国家。惊闻逝世,悼念同深……”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邓颖超的唁电则称:“季鸾先生,文坛巨擘,报界宗师。谋国之忠,立言之达,尤为士林所矜式……”

一位报人的去世,惊动国共两党最高首脑,实为罕见。

张季鸾生于1888年3月,陕西榆林人,13岁丧父,17岁即因学业优秀被选中官费留学日本,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经济

学,1911年回国,出任上海《民立报》编辑。1926年,张季鸾与吴鼎昌、胡政之三人出资将停刊的《大公报》接收下来,重新复刊。张季鸾任总编辑,提出著名的“四不”办报方针:第一不党(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);第二不卖(不以言论作交易);第三不私(除忠于报纸之外决无私图);第四不盲(决不自陷于盲从)。张季鸾和报社全体同仁严格遵守“四不”原则,很快使《大公报》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,“西安事变”的和平解决、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,《大公报》都发挥了巨大作用,张季鸾因此也引起蒋介石、毛泽东的关注和高度评价。

张季鸾多次上庐山,其中1937年6月

至7月之间,他三上庐山“面谏”蒋介石,一时传为佳话。

1937年6月上旬,张季鸾匆匆上了庐山,下榻西谷河南路的一栋英式别墅。这栋别墅建于1934年,面积约250平方米。别墅为石砌二层,一层的两旁凸出两个六边形圆堡,堡顶为二楼阳台,由敞式外廊连接,屋顶前部为三角形,与圆堡阳台构成精美的图案,极引人注目。

张季鸾此次上山是专为营救“七君子”而“面谏”蒋介石的。1936年11月,国民党将要求停止内战、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抗日战线的沈钧儒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史良、章乃器、王造时7人逮捕,举国大哗,各地纷纷展开营救“七君子”活动。《大

客的国家居民,对中国游客日益排斥,媒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,应该有监督社会、规范受众行为的功能,把丑陋的现象公之于众,起到鞭策的作用,使不良行为得到收敛。10月17日刊登的《逃票攻略》一组文章,通过对现在风行的逃票现象的剖析,揭示了逃票的风险和危害,从讲道理的角度循循善诱,使旅游者形成健康文明的旅游意识,使旅游更理性、更文明。

同时该栏目还监督规范旅游市场。由于河南旅游资源丰富,而旅游体制尚不完善,旅游市场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媒体的及时监督规范起主要作用。大众媒介通过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世,从而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作用。如11月14日《诚信游咋恁难》揭露旅游强制购物现象,分析原因,指出症结,提出预防措施,从而让人们警惕,也让强制购物行为有所收敛。

广告信息积极参与旅游资源整合

在对该栏目的样本调查中,河南景点共涉及22个,这22个景点通过推介,使公众认知,成为人们出游的首选,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。以嵯峨山为例,在调查范围内,相关报道11次,把景点从各方面反复介绍,并配有路线、咨询电话等服务提示,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提高了景点知名度。并且该景点在9月26日做广告《金秋情定嵯峨山》:“山峥嵘,水妩媚,云袅娜,秋染嵯峨,宛若山水精灵……”极力打造嵯峨山是恋人约会的好去处。由广告协助推广形象,扩大知名度,使景点得以成名;反过来,这些扩大知名度后的景点又成为媒体的广告源,使广告信息、媒体、旅游企业互动共赢,形成良性循环,整合了旅游的社会资源,培育了旅游市场。

与读者互动,共建旅游文化

“七嘴八舌”一版专门由读者言论来

完成,就某个话题,读者畅所欲言,发表自己的旅游感受。比如在我国导游薪金规定出台之际,推出《旅游购物遭遇终结者?》一版,组织大家畅谈旅游被强制购物经历,游客有埋怨,导游也有辛酸,通过这样的互动平台,使大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抒发了旅游感想,对旅游有更深的体会,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,也提高了对媒体的忠实度。但是在调查中,关于读者互动的力度不大,只有两版“七嘴八舌”,并且固定话题也使读者不易发挥。如果能给读者提供更广阔的互动空间,自由抒发旅游感想,表达旅途中的喜悦之情或倒霉遭遇,这样效果会更好。因为读者选择的景点不同,见识不同,感受不同,自然话题也就更多。建议不妨多一些自由的互动空间。

(作者单位: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)

编校:张红玲

公报》上刊登大量声援“七君子”的文章，“七君子”针对江苏省高等法院的“起诉书”而写的“答辩状”，别的报纸都不敢刊登，《公报》毅然全文登载，引起社会极大反响，但是国民党仍然一意孤行，拒不释放“七君子”，因此，张季鸾专程上庐山，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关押“七君子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，请求蒋介石尽快下令释放“七君子”。

张季鸾很清楚他这样做会有一定风险，但他毫无惧色。1913年，他在北京创办《民立报》，就因披露袁世凯“善后大借款”的内幕，震动全国，也激怒了袁世凯，被投入监狱，险遭暗害。1918年，他在担任《中华新报》总编辑期间，因披露当时的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，激怒了执政官段祺瑞，再次被捕。虽然多次遭受厄运，但张季鸾却从不违背一个报人的良心和公正，不贪财，不怕死，说真话，被于右任誉为“恬淡文人，穷光记者，呕出肝胆”。所以，他敢于为“七君子”的事直接上庐山找蒋介石“理论”。

蒋介石在官邸“美庐”会见了张季鸾。张季鸾直言不讳地劝谏蒋介石释放“七君子”。张季鸾从当前的民心、民意、民族潮流等多方面细加分析扣押“七君子”对当局会造成怎样极为不利的影响。蒋介石听后，推托说这是当地政府的事，“七君子”究竟有没有罪、该不该释放，应由司法部门来解决，他个人也不好过于干涉，以免影响司法的公正。张季鸾明知蒋介石的推托、冷淡，仍然据理力争，说到激动处，声调都大为提高，弄得秘书和警卫都不时进来观察一下。蒋介石面对张季鸾，也无可奈何。

1937年6月下旬，张季鸾二上庐山面见蒋介石，这次他是专为张学良求情。1936年12月12日“西安事变”爆发，张季鸾亲自撰写八篇社论，在《公报》显要位置发表，规劝张学良、杨虎诚释放蒋介石，规劝东北军、西北军将士要顾全大局，不要激化矛盾，以免大乱中华，给侵华日军以

便利，因此，蒋介石对《公报》是心存感激的。但是，张季鸾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极为不满，在很多场合发表言论，要求释放张学良，还张学良人身自由。半年多过去了，张学良还在囚禁之中，张季鸾心中极为不平和不安，左思右想，干脆上庐山直接向蒋介石求情。

蒋介石在“美庐”别墅会见了张季鸾，当蒋得知张季鸾是特地来为张学良



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一起。

说情时，立刻面露不悦之色。张季鸾佯装未曾察觉，继续陈述在国难当头、各党各派强烈要求团结抗战的情形下，扣押张学良会给政府和领袖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。蒋介石听了，丝毫不为所动，只是敷衍地说，这是党国大事，并非一个人所能决定。不管张季鸾怎样据理力争，蒋介石就是毫不松口。当张季鸾走出“美庐”时，心情十分沉重，他终于感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，他深为张学良的命运和前途担忧。

时隔半个多月，张季鸾于7月中旬再上庐山。这次上庐山的目的是，当面请求蒋介石速下抗战的决心，否则无法应对“七七事变”之后全国军民群情激奋的局

面，若再拖延，势必会发生新的动乱和兵变，局面一旦失控，很可能国将不国，领袖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。这次，蒋介石没有让张季鸾失望，痛快地给了他明确的答复，中国政府对侵华日军的态度只有一个字：“打！”张季鸾兴奋至极，向在庐山遇见的每一个熟人说道：委员长抗战决心已定，一个字——打！这个“打”字，像巨风一样，很快席卷整个牯岭。

张季鸾和《公报》的影响不仅使国民党高层不敢小视，就是中共高层也对其极为关注。

1935年7月间，《公报》客观报道了陕北苏区根据地的情况，长征途中的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博古等就是据此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终点。1944年夏，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，毛泽东举行宴会招待记者团。他请《公报》特派记者孔昭恺坐在首席，年纪很轻的孔昭恺一再谦让不敢上座。毛泽东对他说：30年代初期国民党严令各报刊称共产党为“匪”，只有《公报》没有照办，拿我们共产党当“人”。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，孔昭恺才在首席上落座。

张季鸾1941年病逝重庆，蒋介石、周恩来等国共要人都亲往灵堂吊奠，各党各派对张季鸾的评价都很高。蒋介石送的挽联是：“天下慕正声，千秋不朽；崇朝嗟永诀，四海同悲。”周恩来、邓颖超送的挽联是：“忠于所事，不屈不挠，三十年笔墨生涯，树立起报人模范；病已及身，忽轻忽重，四五月杖鞋次，消磨了国土精神”。张季鸾魂归故土，陕西各界隆重举行公祭大会，西安市下半旗致哀，蒋介石亲临公祭大会祭奠。张季鸾作为一个报人，身后如此哀荣，实为少见。张季鸾本人极有自知之明，临终遗嘱写明他的墓碑上只写：“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。”他的家人完全遵照他的遗嘱，只在墓碑上刻这一行字，没有任何赞美之词。

(作者单位：江西省庐山管理局)

编校：张红玲